

著名军旅作家刘秉荣近三十年研究民国历史的又一部力作！

共和殇

一段未被完整记录过的历史

孙中山说：“十年间，要将中华民国变为世界强国！”

中国近代最混乱最无序的时期

复辟闹了两回，大总统换了六个，国会内阁争斗不断，法律法规朝立夕改……
怎一个“乱”字了得！

刘秉荣 著



群众出版社

下 册

第三十六章

惩治帝制祸首

南北双方在恢复《约法》和重开国会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后，南方护国军又提出要惩治帝制祸首，并认为这也是关于和平统一的一个问题。当袁八面威风之际，一个个投机政客都曾争先恐后地向袁称臣效忠，特别是各省北洋军阀大小头目，几乎都为袁的称帝摇旗呐喊，都属罪魁的角色，但护国军方面仅把罪魁锁在“十三太保”上。“十三太保”即“筹安会六君子”的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李燮和、胡瑛和被称为帝制“七凶”（又称“七小人”）的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光绪年间，戊戌维新的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也称“六君子”。这“六君子”因帮助光绪变法，被慈禧斩首于北京的菜市口。当时，袁世凯出卖了新党，以“六君子”的头颅换得他的富贵。大概是轮回，到了民国四年，洪宪“六君子”促袁称帝，结果搞得袁众叛亲离，把命也赔进去了。后人论袁，说他以“六君子”起家，亦以“六君子”亡身。戊戌“六君子”的核心是湘人谭嗣同；洪宪“六君子”的主角杨度也是湘人；打倒袁世凯的蔡锷也是湘人。所以，人又说“猿”死“乡人”。

其实，洪宪“六君子”不过一个纵横之士、一个失意军人、两个国民党人、两个书呆子。杨度是创办人又是包办人，其他五位都是他所物色来的。其中，只有李燮和是因穷困投朋友而碰上了这个“大好机会”。

自1916年3月22日袁被迫撤销帝制后，达官贵人纷纷避难出京，杨度即成为众矢之的。而其仍坐在家里，在一片索债声中过着荆天棘地的生活。国史馆员向他索薪，包修房屋的泰来洋行也向他索欠。早在袁尚未生病时，4月12日，杨度即呈文辞职，内称：“各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微忱，究无补于大局。世情翻覆，等于瀚海之波，此身分明，总似中天之月。以俾斯麦之霸才，治墨西哥之乱国，即令有心救世，终于无力回天。流言恐惧，窃自比于周公，归志浩然，

共和之殇

颇同情于孟子。所有辞职缘由，理合呈请大总统钧鉴！”

后来有好事之徒把这呈文戏改数字，刊于报上，为：“各位参政，一年于兹，虽勉竭其孤能，究无补于帝制。燃犀镜澈，毕竟公道昭然，拍马技穷，自悔天良丧尽。无俾斯麦之霸才，羨日耳曼之宰辅，即令有心献媚，终于无福封公。流言恐惧，窃难免于狗烹，归志浩然，颇同情于兔脱。所有悔罪辞职缘由，理合奏请大皇帝圣鉴！”

5月1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访杨于其寓所，杨仍高谈阔论如平日。记者谓其态度何以如此安闲，词意如此坚决？杨道：“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梁任公是我的老同志，他一变再变，我则始终守着本位。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诿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在护国军的通电中，首先提出要惩办的帝制祸首是所谓“六君子”和“七凶”，事实上袁克定是第一个应当列为祸首的人，此外那些劝进称臣的流氓政客，以及为袁世凯镇压起义的“征滇将领”，都理应作为帝制祸首惩办，而且证据确凿。但由于党派之争、府院之争、军政首脑私人庇护之争，使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时袁克定不仅有恃无恐，安居彰德，还致电黎、段，为“七凶”中的雷震春、张镇芳乞情，结果两人就从祸首名单上剔去了；冯国璋为段芝贵的保镖；李经羲又以严复、刘师培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人才，力保开脱。时又有人向段建议，将李燮和和胡瑛两个变节的同盟会员去掉，以讨国民党好感，段从其意。于是，李燮和、胡瑛两人也在免惩之列。原有“十三太保”只留下五个。黎、段也觉得不好交代，遂又添上非首要分子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7月14日，黎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称：“自变更国体之议起，全国扰攘，几陷沉亡。始祸诸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着拿交法庭，详确讯鞫，严行惩办，为后世戒。其余一律宽免。”

杨度在帝制祸首名单中，从云南起义通电起到最后政府发布的惩办令，始终名列第一。所有列入名单的人都有人讨过保，连梁士诒也曾有人为他乞情，唯有杨度在确定名单以后，从来没有人为他讲过话，仿佛一致把他当成罪行最严重、无可置疑的帝制祸首。其实，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帝制自为的袁世凯。杨度因一贯主张君主立宪，在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中，其始终被利用作为制造舆论的工具。若罪论行，他远不如袁克定、梁士诒、段芝贵、雷震春、张镇芳、陈宦、倪嗣冲、吴炳湘、张敬尧、曹汝霖、周自齐等人的严重。但他一非北洋军阀系统的人，二非进步党、国民党人，三非遗老重臣，段又是他的死对头，因此，他是第一个“挨刀”的了。在惩办名单中补入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也都是往日和杨度

关系密切的法律系人物,把他们加上,正是加重对杨度的打击。

杨度被通缉以后,移居到天津外国租界卜局天津清鸣台八号。当时有人曾以“一羊驱三午”相讥,羊指杨度,三午是魏午庄、端午桥、夏午诒。杨在天津屡欲赴京自首,被家人环阻始止。他在这时写下了《避难中作》一诗:“去岁遭世变,逃遁栖海隅。依托外租域,存此亡命躯。乱世轻人命,苟命古所誉。官吏索我缓,容我使读书。文史为吾友,应接在一庐。有时歌以啸,天风若与俱。尤游既卒岁,阳春俟以敷。林花次第开,好鸟时相呼。往来二三子,皆复患难余,喧寂无异趣,穷达理一如。”

杨度表面上虽然是“文史为吾友,应接在一庐”,但他内心深处还是夙志未酬,想物色一个有实力的同道者作为依附,来继续实行他的君宪主张。

孙毓筠、胡瑛两位变节的国民党人,自“二次革命”失败后,党人或死或逃,二人感觉国民党已无复苏之望,于是皈依佛法,延请谛闲、显珠二大法师讲经。“筹安会”成立后,孙把谛闲公介绍给袁克定,谛闲告袁:“公子将来大贵,请爱惜此身留为世用。入世法与出世法本自圆融。”袁克定听后大喜道:“将来若有那一天,必为佛门尽力。”在国体投票前,孙著有《反对世袭总统议》,成为“六君子”的第三篇劝进大文。惩办祸首的通缉令下后,孙已赴天津,外传孙在天津自杀未遂。

胡瑛当年曾与吴樾同谋炸五大臣,乙巳同盟会成立时首先加入的是他,化装在京汉线跟踪铁良,欲伺机行刺的也是他。人谓胡瑛是个惯走极端的人,革命革到极端,反动也反到极端。他做革命党要亡命,加入“筹安会”也要亡命。

“六君子”中的严复本是个著名学者,其参加“筹安会”是糊里糊涂的,只由杨度一通说辞,第二天报上就登出他的大名,赫然列在“筹安会”发起人中。严的老朋友林纾见他列名“筹安会”,问道:“又陵,你怎么干出这样的事来,无论袁家成败,你都不值得啊!”严却淡然说:“不相干,让他们去闹!”林说:“你应该否认吧!”严以漫不经心的态度说:“不否认也罢!”不过以后他对“筹安会”的各种通知单不理不睬。当梁启超发表那篇轰动一时的《异哉国体问题》,袁想让他做一篇煌煌大文,乃派夏午诒登门以巨金为求,严复当场拒绝。通缉祸首令下来后,林又对严道:“又陵,你要离京啊!”严道:“是祸就不能逃,我老了,已不怕什么,文章我没有做。都是他们做的,是非终可大白,最好听之任之。”

严有十足的中国读书人的怪脾气。他的怪癖是喜欢唱反腔,人之所好恶之,人之所恶好之!

“六君子”中另一位著名的学人是刘师培,也曾是个革命志士,然后变节。袁死后,他像断了线的风筝,由西华门私宅迁至法国医院。他本被列入通缉名单之中,幸亏李经羲相救,才把他从“帝制祸首”的名单中剔了出来。于是他邀严复同至东厂胡同黎宅谢恩,然黎没有接见。刘在帝制失败后,曾作诗一首解

共和之殇

嘲,其诗云:“荀孟不复作,六经秦火余,笃生杨子云,卜居近成都。文学穷典坟,头白勤著书……虽非明圣道,亦复推通儒。紫阳作纲目,笔削而口诛,唯据美新文,遂加莽大夫。班固传信史,微词雄则无,大醇而小疵,韩子语岂疏?宋儒作苛论,此意无乃拘?吾读杨子书,思访杨子居,斯人今则亡,即吊空踌躇。”这首诗是替杨雄辩诬,也是替自己辩诬。

李燮和在“筹安会”宣言发表后,忽有龚先曜谓李系光复军夙将,曾冒领军饷尽入私囊。前湖南省议会议员《湖南公报》经理李海虽系李燮和之弟,然其发表文章请诛“六君子”以谢天下,当时舆论将汤化龙、汤芑铭兄弟与李海、李燮和兄弟并列,以其同为兄弟,而路线不同之故。

顾鳌字巨六,四川人,光绪卅一年赴日本留学。汪兆铭和黄复生在北京谋刺摄政王失手被捕后,顾鳌和章家祥承办此案,暗中多予维护。洪宪帝制筹备时期,袁派顾为法典组主任。许多草典为其起草。到了北伐时,顾随杨度投奔上海杜月笙门下为食客,最后乃改营古董捐客生意,不再在政治圈内活动。

梁士诒是袁世凯时代红得发紫的北洋派要角,在民国初年袁世凯政府中,他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洪宪帝制筹备时,梁发起“全国请愿会”为劝进的行动组织,一举而取代了“筹安会”。梁被宣布为帝制祸首,亦从不声辩。

夏寿田字午诒,湖南湘潭人,和杨度是同乡又是同学。光绪廿四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曾为端方的幕僚。后随袁世凯,深获器重,设政事堂于总统府,总统府秘书长为内史长,夏为内史。夏被通缉后,即匿居天津租界,后去上海。晚年信佛,在福州鼓山受戒。

朱启钤字桂莘,贵州紫江人,光绪卅一年,清廷设立巡警部,朱任北京外城巡警总厅厅丞。先后任陆征祥和赵秉钧内阁的交通总长。洪宪帝制筹备期间,以朱兼任“大典筹备处”处长。受通缉后亦隐匿天津。后来朱一度在徐世昌总统任内南北和议时受任为北方总代表,从此退出政坛。

周自齐字子讷,山东单县人。北京同文馆出身,后赴美留学。清末曾继伍廷芳以参赞名义代理驻美公使。曾先后出任中国银行总裁、交通总长、财政总长兼盐务署督办、农商总长,为袁政府财政方面的红人,也因此而被列入帝制祸首名单。

薛大可字子奇,湖南益阳人,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曾因革命在上海被捕。民国成立后在北京为新闻记者,民国二年春被选为众议院议员。“筹安会”事起,遵杨度之意办了《亚细亚报》,刊登各地拥戴的消息送给袁过目。袁每天从这张假报上看到的尽是假消息,因此薛可以说是洪宪帝制运动中的一个要角。《亚细亚报》曾在袁称帝前两个月于上海设分馆,对外声言已请黄远生为主笔,黄远生为此曾登报否认,并随即逃往国外。其到美国后,被爱国华侨把他当做帝制余孽炸死了。《亚细亚报》的上海分社在出报的第二天就遭爱国人士投

掷炸弹,吓得职员们不敢去上班,报纸不久也寿终正寝。

薛、顾名列帝制祸首后,有好事者把“顾鳌薛大可”两人名字联在一起征求对联,某名士对以“潘驴邓小闲”为下联,令人拍手称绝。

然张勋对惩办杨度等“祸首”不苟同,其于6月20日发出电,其电称:“君主民主,主张各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近日南方各省坚执前言,操之弥急,如果相持不下,则南北势成冰炭,仇衅相寻,责难无已,万一战端再启,外人从而干涉,窃恐瓜分之祸,不在帝制发生之日,而在共和再造之时,律以误国之愆,必有尸其咎者!匪特公论自在人心,即勋一人亦断不承认。而报纸讹传,竟谓勋曾电政府,亦以惩办祸首为请,实系妄相揣测。不知勋素持公道,屡有宣言,定不随声附和,自相矛盾,且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张勋这一声明发出以后,立即得到杨度等人的感颂。张勋对杨度曾去函安慰,并邀他到徐州去作客。杨也了解张在帝制主张上和自己有同道之处,因此对张表示推尊感激。

第三十七章

奉系军阀的形成

张作霖，字雨亭，人又习称老师、雨帅。清光绪元年二月十二日（公元1875年3月19日）生于奉天省（今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的一贫苦之家。后随父迁居贺掌寺。张的先祖姓李，河北大城人，李家姑母嫁到张家因无后，将李家侄过继为子。清道光初年，其先祖因大城遭水灾，闯关东到奉天省海城县落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际，张作霖投效毅军马玉昆。张精明强悍，善骑射，备受头领赏识，遂被升为哨长。中日停战后，毅军撤回关内，张作霖还乡，在海城县高坎村当兽医谋生，因常给绿林马帮医马疾，因此结识了许多绿林朋友。1896年，张作霖到了广宁（今辽宁北镇），经当地绿林首领冯德麟介绍，投身于绿林。其间，张作霖先后与张景惠、张作相、宋老丰、崔大楞、齐大有等人结为兄弟，率二十余人在桑林子（今辽宁台安县西北）组成乡团，保境安民，后移居广宁县中安堡镇，张作霖被推举为“保险队”的头目。

时亲俄的土匪头子金寿山拉拢张作霖参加俄军，张严词拒绝。金大怒，寻机报复，让其干儿子打入张的内部。1902年的2月7日（旧历腊月廿九日），金趁张欢度除夕之际，率部对张进行了突袭，张措手不及，慌忙逃走，逃到台安八角台与张景惠会合。张景惠推荐他为团练长。从此，张作霖与张景惠相依为命，合股同流，部下有七十余人。后二张又与汤玉麟一起，杀了一个头目叫项昭子的另一股土匪，自此，张作霖、张景惠、汤玉麟遂合股拥有二百余人，其势力已超过其他各帮，成为辽西地区一支较大的土匪武装。

1902年，清政府分令各府、县，凡是辖境内的大小匪股和游杂团队，肯弃暗投明者不咎既往，收编为正式防军。这时，张作霖的团练队已拥有二百五十余人，决计接受招抚，适逢盛京将军增祺家眷途经辽西，为张的部下拦截，张便趁机讨好增祺夫人。经增祺奏请清廷，同年11月9日，被新民知府增韞收编为地方巡警前营马队。张作霖被任命为帮带，驻防新民和桑林子一带。

1903年7月,张作霖升任管带,张景惠升为帮带。自此,张作霖的军队由绿林军变成了清朝政府的地方部队。

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腐败无能的清政府竟置战区人民的疾苦于不顾,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身为管带的张作霖,从感情上是反对俄军的,但在俄军势力的压力下,又讨好俄军,暗地帮助俄军筹集粮草,提供情报,有时穿上俄军服装偷袭小股日军。后来日军实力增强,他又为日军效劳,为表示他对日军效忠,曾在“愿为日军效命书”上立誓画押。张作霖就这样圆滑地应付了日俄侵略者,进而壮大了自己的势力。

日俄战争结束后,张作霖的兵马进一步扩充。1906年奉盛京将军赵尔巽、新民知府沈金鉴之命将人马扩展编为五个营。张作霖升任巡防五营统带官(相当团长)兼中营营长。时第一营营长汤玉麟,第二营营长张景惠,第三营营长张作相,第四营营长邹芬。

1907年,赵尔巽设立两个军事机构:一个是督练公所,赵自兼总办,主持新军训练;二是巡防营务处,张锡奎为督办,主持旧军的整顿工作。张作霖被任命为营管带,隶属于巡防营务处。张锡奎因十分爱马,因而人送绰号“快马张”。张作霖得知后,便以“良马相赠”,并拜张锡奎为“义父”。之后,张作霖又率部先后剿灭了数股胡匪,使其人马又增加两营,第六营营长为依荣廷,第七营营长为张香九。

是年5月,清政府在东北正式建省,任命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当时最使徐世昌头痛的便是辽西巨匪杜立三。同年6月,张作霖奉命前往讨剿,张通过其义父(杜立三之同族叔父)杜泮林出面,骗杀了杜立三。因张剿巨匪有功,徐下令赏张白银千两。1908年,徐世昌又命张作霖追剿被沙俄收买的蒙匪。张作霖亲率所部与蒙匪短兵相接。至翌年春,除掉了蒙古马贼白音大赉,捉住了牙什,驱逐了蒙古队的领袖陶克陶胡。一时间,张部人马声威大震。1909年,巡防营务处督办张锡奎又将奉天省的地方军队建立了前、后、左、右、中五路巡防队,张作霖被晋升为前路巡防营统领(相当旅长),调驻洮南。后路统领为吴俊升,驻辽源、通辽一带;左路统领为冯德麟,驻北镇、黑山地区;右路统领为马龙谭,驻凤城;中路统领为金道坚,驻奉天、铁岭附近。是年2月,清政府以锡良代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1911年5月复以赵尔巽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不久,辛亥革命爆发。

武昌起义的枪声响遍全国后,时驻奉天省城的新军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与革命党关系密切。其与陆军第六镇统吴禄贞和新军第二十镇统张绍曾联系,三人决定在东三省宣布独立,驱逐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并决定推举蓝天蔚为关外讨虏大都督,革命党人张榕为奉天省都督。不料事泄,赵尔巽在咨议局副议长袁金铠推荐下,急令张作霖率部进城。10月26日,张作霖率所部由洮南开

共和之殇

拔,路经通辽,直奔奉天省城,解救了赵尔巽的困境。这时,中路统领金道坚调职,赵尔巽遂改由张作霖兼任。至此,张作霖掌握的兵力有五千余人。这时,奉天省咨议局议长吴景濂等也酝酿独立。赵尔巽策划利用张作霖的武力牵制新军,压迫咨议局。在省咨议局召开的官民大会上,吴景濂、蓝天蔚在发言中刚表示有独立之意,张作霖便一跃而出,立于台上,举枪威吓道:“今日敢与总督异议者,请视此枪。总督能容忍,此枪不能容忍!”此后,赵尔巽将蓝天蔚撤职。11月12日,奉天各界集会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推举赵尔巽为总会长,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桢为副会长,张作霖兼任保安会军政部副部长。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后,赵尔巽摇身一变被改任为中华民国的奉天都督兼民政长。张作霖仍甘愿为赵尔巽出力,其在“保境安民”的借口下,以武力制服了张绍曾、蓝天蔚等军,同时镇压了咨议局议长吴景濂的独立活动。

时同盟会会员张榕等把东北革命党人联合起来进行斗争,于1911年11月17日,在奉天组成了“联合急进会”,推张榕任会长,张根仁、柳大年、李德瑚任副会长,领导群众进行武装斗争,庄河、复州等地纷纷响应武昌起义。

1912年1月23日晚,赵尔巽令张作霖先后派人刺杀了张榕、田亚斌和宝昆等人。因张扑杀革命党人“有功”,经赵尔巽保奏,清廷特授以张为“关外练兵大臣”。但张之举也激怒了军民,甚至连张的部分兵弁在革命党人的争取下,也转向革命方面。

1912年6月19日,蓝天蔚的第二混成协第三标士兵起义,赵尔巽闻讯大惊,急令张作霖率兵镇压。其他各标兵也跟随哗变部队与张作霖之守城部队展开激战。在此次兵变中,张作霖乘机遣散所谓“有嫌疑的官兵两千多名,使第二混成协兵力大为削弱”。从此,张作霖的人马几乎独霸了奉天省城。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赵尔巽向袁世凯保荐了张作霖。袁遂于是年6月28日下令将奉天中、前路巡防队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任命张作霖为中将师长,汤玉麟为步兵第五十三旅旅长,孙烈臣为步兵第五十四旅旅长,张景惠为第二十七团团长,张作相为炮兵团团长。同时,将冯德麟麾下的奉天左路巡防队改编为第二十八师,任命冯德麟为中将师长,张海鹏为第五十五旅旅长,汲金纯为第五十六旅旅长。由后路巡防队抽出一部分编为中央陆骑兵第二旅,任命吴俊升为旅长。

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两师的成立,是奉军建立陆军的开端,也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分支——奉系军阀的发轫。

张作霖的野心是要称霸奉天全省以至全东北,而摆在张面前的,外有日本等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干涉,上有袁世凯派来的奉天督军张锡銮、段芝贵的掣肘,下有与其势均力敌的对手冯德麟的抗争,张必须以灵活的策略应付各方面的对手。

时东北已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张作霖决心讨好日本,借日本一臂之力,“获取奉天将军”的职务。但张的讨好举动没有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亦没有引起日本的足够重视,因为日本军国主义热衷于满蒙独立运动,张不是日本人的理想人物,但张的势力也给日本人留下了好的印象,后来张的许多行动也都得到了日本的支持。

张作霖千方百计地向袁世凯靠拢,以攫取奉天将军的职位。而袁世凯对实力很强的张作霖亦采取了“恩威并用”的策略。一面利用张的武力维持北洋军阀政府在奉天的统治;一面又严防张的叛离。而张对袁也是采取了既讨好又反抗的对策。

1912年11月3日,赵尔巽辞职离奉。袁提升他的把兄弟张锡奎为奉天都督兼民政长,节制吉、黑两省军务,张于11月16日就职。袁为了使张作霖能给自己卖命,对张加以重用。是年11月,袁的北京政府为讨伐蒙匪对奉、吉的进犯,命令东三省设筹防处,任命张作霖为总办。前文述过,第二年3月31日,袁召见张作霖入京,对张大为夸奖,使张受宠若惊,竟拿出私人“积蓄”补发官兵欠饷,购买军械。袁见张对己如此效忠,更加高兴,马上奖给张一等勋章。时张以“征蒙”为由,向外国购买机关枪和大炮,扩充了武装,伺机夺取奉天军权。

当奉天将军张锡奎因“奉省政务繁多,以老病之身不胜重任”提出辞职时,张见时机已到,遂于1915年间曾两次进京活动,然未能如愿。

尽管张作霖不断向袁世凯讨好,而袁总担心自己称帝时,张会突然叛离,对张不仅不信任且严加提防。当张锡奎辞职后,袁即于1915年8月22日派其心腹段芝贵任奉天将军兼任巡按使,以监视张作霖,同时为安抚张作霖,袁暗示张“它日有机予以提拔”。张无奈,只好继续隐忍自重,等待时机。

袁谋划帝制,段芝贵自然卖力,张作霖也觉得还是袁的这头炕热,便再次向袁讨好,甚至说出“如帝制不成,死不再生”之语。

然袁称帝后,仅封张为二等子爵,张对此极为不满,其愤懑道:“吾薄辽东王不为,何子爵也。”袁对张实在是不放心,遂又于1916年2月调派张率所部南征湖南。时张的谋士袁金铠谓“袁已众叛亲离”,要张“静观事变,趁机而起,掌握东省军政大权”。张点头,并以南征为名,骗取了袁的粮饷、军械,而暗中却开始做驱逐段芝贵,夺取奉天军政大权的准备。

张作霖为赶走段芝贵,与冯德麟密谋,让冯以武力相逼,张从中配合。张密令其军队在夜间开枪,然后其向段芝贵报告说:“冯要进兵奉天!”段惊慌失措,张拍胸担保,而次日又谓段,说冯已把第二十八师全部开来了,来惩办帝制祸首。段更惊,其迫于形势,急忙取官款二百万元,军火若干,调专车赴京。张为表示欢送,又赠给段以大批礼物,而同时又要冯德麟派兵拦截段的专车,将段带走的官款与军火截住。冯按张计实施,结果不仅使段丑态百出,张还当了回“大

共和之殇

好人”，张电令将段的专车放行。段回京后，向袁面告实情。袁感到再派外地人去奉已不可能，遂于1916年4月19日正式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6月4日，又任命冯德麟为盛武将军兼巡按使军务帮办。袁死后，张作霖便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张大权在握后，起用了原有的绿林兄弟，还容纳一批军校出身的军官，同时也网罗一批官僚政客文人，为其治政理财。

至此，张作霖不仅实现了称霸奉天全省的雄心，也开始形成了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冯国璋（后为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阀的北洋三大派系。

奉系军阀集团初步形成之后，张作霖最关心的是“统一”奉天军政，从而称霸奉天全省。为此，他决心扫除障碍，排除异己和制服居“功”自傲的“绿林伙伴”，建立自己的统治权威。在他看来，“统一”奉天军政的主要障碍是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和绿林兄弟汤玉麟。

冯德麟是张作霖的“绿林”前辈，既有武装实力，又是老亲日派。张作霖出任了奉天督军后，冯对“耻居张氏之下”气得了不得，这是张作霖早已料到而深感头痛的。张在接督军任命时，为了安抚这位冯大爷，张作霖曾做了一次假退让的表演。他召集所有弟兄开会，并痛哭流涕地大骂段芝贵使用离间手段，挑拨弟兄感情，并即时发出通电，坚辞北京政府任命，力荐冯德麟做督军。而段芝贵对冯已极为反感，其在袁的面前百般挑拨，袁政府即“复电不准”，张再次请辞仍不准，张还要辞，这时汤玉麟对张道：“你一定要辞，北京政府要是另派一位外省人来，我们怎么办？我看还是就这样了吧。”众弟兄都认为汤之言有理，并说对冯大爷可以另想办法，张这才安心当了奉天督军。

然冯德麟这大爷并不甘心，在张作霖任督军之后，冯坚持不就军务督办之职，并闭门谢客。张作霖亲自登门拜会，说了许多兄弟当有福同享的话，冯这才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要另设军务帮办公署，其组织与督办公署一样。张当然不会接受这种唱对台戏的要求，乃电袁请中央调节。袁政府回电称：“帮办公署未便另设，帮办公费每月可拨付十五万。”张即带了袁政府的回电和十五万去见冯，冯将款如数退回，并电袁辞职，而后率兵回广宁。张即派第二十五旅旅长孙占鳌携带礼品及现金三十万到广宁犒军，婉言劝冯回省。5月22日，冯率部回省城，张立刻亲往拜会，而冯也不回拜。当晚，张在将军府备酒洗尘，冯也不肯去，张作霖只得移樽就教，把酒席抬到冯的司令部，招歌妓十余人侑酒。然张的任何礼貌都无济于事，冯眼中全无张这个盛京将军。时冯致电袁世凯，请准增七营兵，大有与张作霖一决雌雄的决心。此后，冯提出的条件越来越苛刻，不仅要求“帮办权限与盛京将军完全相等”，而且要兼任省长。

张看到若再对冯迁就，就要将大权旁落，遂决心武力解决。而冯也不示弱，向张发出最后通牒。就在双方剑拔弩张之际，奉天公法团吁请双方和衷共济，

万勿各走极端。张权衡一番,时他最担心日本人插手,缘冯大爷是老亲日派,于是张最后还是放弃了武力解决的主张。

在张、冯斗争日趋尖锐的时候,张作霖和汤玉麟的矛盾也激化了。

汤玉麟时为第二十七师第五旅旅长,绰号“汤二虎”,其部队的军纪很坏。1916年冬,张作霖支持“文治派”首领王永江提出的仿效日本警察制度改革警政,在省城各处设立“派出所”,依法裁抑诸士卒,以安民心。如此一来,军警冲突事件一再发生。时汤等人认为天下是军人枪杆子换来的,王永江没有功劳,却高高在上管辖军人,汤因而多次向张进言,想搞掉王,结果遭到张的一顿臭骂。时张认为枪杆子能打天下,不能治天下。张作霖对王永江的支持,不仅引起了汤的不满,连张景惠、孙烈臣、张作相等多数武官也都不满。到了1917年的春节,汤玉麟等在省城设宴,唯独不请王永江。张作霖见王永江没到,大为不满,道:“我看上的人,你们就反对,我用定了这个姓王的啦!谁反对谁就辞职!”

汤玉麟应声而起道:“你甭骂街,辞职算不了什么!”

事后,汤玉麟煽动其他武将拟定一张呈文,共同去见张作霖,要求把王永江撤职,结果张作霖把呈文撕得粉碎,还指着汤玉麟的脸大骂。

汤玉麟愤然归营,要调兵实行兵谏,吓得王永江闻风而走,张作霖也调兵自卫。冯德麟见状,便趁机与汤玉麟相勾结,共同对抗张作霖,要求张作霖任他为省长,任汤为第二十七师师长,否则将自由行动,并要求北京政府罢免张作霖。冯同时暗中派人在省城策动第二十七师的人反张。

这时,曾一度附和汤玉麟的孙烈臣、张景惠、张作相等,毕竟为张的老友,都站到了张作霖方面,洮辽镇守使吴俊升也表态拥张。时总统黎元洪支持冯、汤反张,而总理段祺瑞却支持张反对冯、汤。

张作霖不但取得了段祺瑞的支持,并通过他的日本顾问,求得了日本的“谅解”和支援。

冯德麟得知日本和段祺瑞支持张作霖后,便软了下来,不再和汤联盟,汤孤立无援,只好“逃往医巫闾山寨做了山大王”,纠集土匪千余人进行活动。到1917年3月29日,张作霖下令免去汤的旅长职务,任命邹芬代理第五十三旅旅长,并命第五十四旅旅长孙烈臣和骑兵团长张作相,讨伐汤玉麟。汤玉麟走投无路,遂逃往徐州投奔张勋。至此,张作霖与冯、汤的斗争,以汤玉麟的失败和冯德麟的偃旗息鼓而告终。

第三十八章 广东的“龙虎斗”

前文述过,1916年6月9日,广东都督龙济光第三个宣布取消独立。龙是在广西护国军和广东各地民军的四面包围下被迫宣布独立的,而且在宣布独立时,龙得到了袁世凯的秘密指示和“深切谅解”。此后,龙仍然与袁有密电往来,袁死后,龙又与段祺瑞取得了密切联系。龙擅自取消独立之用意,是为了摆脱军务院的管束,完全倒向北京政府的一面。其认为北洋派是全国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是极强的靠山。龙在取消独立的同时,秘密电请段内阁三路出兵“援粤”,即除由海道运输北洋军来粤外,并请江西、福建两省的北洋军由陆路开进广东,帮助其夹攻滇军,然后再帮他驱逐桂军,以恢复其在广东的势力。与此同时,龙还广招股匪,护充军队,准备武力进攻护国军和民军。龙的行径激起护国军和广东各界人士的一致声讨。孙中山发出讨龙号召。梁启超、唐绍仪以及护国桂军将领莫荣新、谭浩明、林虎以及国会议员等,也纷纷发出通电,谴责龙济光的罪行,要求北京政府罢免龙济光,另简贤能。但在段祺瑞等北洋军阀头子的支持下,龙济光有恃无恐。

护国军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时,代理抚军长岑春煊和广西都督陆荣廷曾电请云南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取道广西、广东向江西进兵,因此李烈钧率领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于5月12日开到肇庆。时袁尚未亡,龙自己既不愿出兵北伐,又拒绝滇军通过广州,他的理由是害怕引起军队的误会和冲突。时陆荣廷也害怕在广东境内引起冲突,遂与龙商定,滇军由肇庆经三水到滘江口,转乘火车到韶关,这样,就避免经过广州。不料当护国第二军张开儒梯团6月7日到达韶关的时候,龙电令韶州镇守使朱福全闭城不纳,迫使滇军露宿城外,龙还命朱福全拆毁铁路,阻止护国军通过。

对于龙济光的阻挠,6月15日,李烈钧致电唐继尧和岑春煊,其电称:“迭据前军官长暨本部特派员报告,南韶连镇守使、道尹等,对于本军颇多敌意行为,

阻碍威胁,故惊居民,举动乖谬,将士骇怒。当此军情紧逼时期,居心如此,殊为可憾。我抚军长暨龙都督,叠电开诚通告各地,该镇守使等竟置若罔闻,任意藐玩。此必该官吏等私情庇敌,嫉我义师,殊违龙督厚待,故乡子弟诚意。拟请迅下命令,将该镇守使、道尹等分别调肇,另委贤员接充,以免冲突而安军民。立盼示复。”

6月17日,李烈钧致电岑春煊和龙济光,电称:“本军自先月出发以来,陆续过潞,随到随即搭车上韶,乃本日,上下各车竟中断不至。当经派员查询该站,据称:‘奉总局电令:上行各车到源潭止,下行各车到黎洞止,因中间有土匪欲出车路’云云。查由源潭至黎洞,中间即潞江口,乃滇军兵站所在,军队往来继续,暂驻附近地方,均安谧如常,该局所云,究何所指,殊属不解。在该局自断交通,无故惊扰,原无可惜,若因此肇启衅端,贻误在局,谁负其咎?除派员查探外,特电奉闻。”

同日,李烈钧又致电岑春煊,说“龙督在距潞江二十里源潭车站陆续增兵,省来各车,则仅至源潭,不令上驶”,由此,他“心念将士力寡兵微,倘有意外,疚负何似,惴惴忧危,五内焦沸”。

这时,龙军在韶州城中架炮向滇军轰击,滇军愤而还击。6月20日,李烈钧就此致电岑春煊,称:“韶州之事,滇军为自卫计,相机抵御,原非得已……似此情形,将何以处?除飭各军镇静无躁外,请赐维持,非特滇军之幸。”

广东内部发生军事冲突和龙济光擅自取消独立,正符合段内阁分化西南的要求。因此,北京政府发表命令对龙大加表扬,说他“具有世界之眼光”。6月21日,又派他兼任广东巡按使。

滇军与龙军在韶关激战,龙军不支,开城投降。

6月27日,李烈钧致电唐继尧,称:“粤局内部纠纷,龙意反复。本军到肇后,龙尤视若芒刺。钧推心置腹,叠电周旋,但获敷衍,猜忌如故。奉令北徂,绕道出韶,即为此故。不意我军初发,龙即赶运大炮四尊至韶……本月19日,藻林(张开儒字)率队到韶,忽被炮击,互战两时,守兵内崩,镇道跳匿,韶城纷乱无主,遂由藻林暂管维持,电候岑公委员接替……惟粤人恨龙已深,各路司令会议将声罪驱除,若龙犹不自戢,则溯然大波或竟继此而起也。”

这时,龙济光密电请段速派北军三路入粤援助的电报被军务院截获,由代理抚军长岑春煊通电揭破,龙济光无法抵赖,就伪造了军务院不肯撤销和岑、李两人密谋攻占广东的往返电报以资抵制,并于7月3日调兵北上。

同日,李烈钧致电北京政府,电称:“韶州镇守使朱福全之军队,首先开炮轰击,甘为戎首。滇军纪律严明,举动慎重,倏被炮击,不得不拒,请派员调查,以分曲直。”

共和之殇

7月4日,李烈钧又发表了致《龙济光部将书》,称:“龙氏踞粤,几及三载,朋比袁贼,残害百姓,开赌卖烟,搜括财货,淫威所被,闾里为墟,怨声载途,如火益热……今者袁贼,既伏天诛,龙氏长城,塌然崩坏,莫、李之师,出乎东西,滇中劲旅,临兹北路。海军舰队,发自沪滨,分遣来粤,游击南海,雄师压境,四面受敌。内有伏莽,外无援兵,虽居层台,焉能高卧?其状之困,有若囊鼠,为虺为蛇,岂等崇朝?势力既孤,颓灭立至,见机而作,是在智者。”

7月6日,李烈钧又致电黎元洪、段祺瑞、唐继尧等,电称:“滇军驻韶,龙济光迭次阴饬所部,前后威逼,致与我军前部在韶关猝开衅端,幸死地求生,将士危虑,凌厉艰险,未为所歼,殊龙意未餍,密布重兵,截断江流,阴我交通,塞我后路,清远、从化,楚歌布闻江日。忽由源潭挥兵上逼,炮多械利,往复逼攻,赖将士自卫,人思救死,苦战三昼夜,始逐渐击退龙军,保全师旅。念平昔承学师友,颇蒙知遇,临渊戒惧,重自督励,仰式高模,幸未陨越。且龙军败丧之余,纷纷溃窜,从此敌情中摧,或不致再相逼害。惟抚念将来怦然心恻,龙氏不去,粤终不安。望我总统、总理、抚军诸公,迅赐明鉴,曲予维持,无任拜祷。”

段祺瑞接到龙济光的三路乞援密电后,即电令江西督军李纯将由湖南调回江西的北军第六师全部调往赣南,令福建督军李厚基出兵闽南,并派萨镇冰率领海军以保护外侨为名开往广州,三路人马支援龙济光。李纯、李厚基虽然执行了段的命令,但他们派兵的目的只是为了防止滇军侵入,而不热心越境向滇军进攻。这时,龙的人马也于7月3日北上应援。7月3日,李烈钧奉命指挥护国第二军攻占源潭,广西护国军莫荣新、谭浩明等部攻占三水,邓铿等部亦从西江、北江、东江三面对龙济光军发动攻击,龙军败退回广州。

龙的迅速战败,使段来不及布置援龙。这时,济军困守观音山与滇军血战,有全军被歼的危险。因此,段秘密指示龙于万不得已时退守琼崖,保全实力,待机反攻。段内阁又于7月6日发表命令,将李烈钧调到北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广东省长,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但又令陆荣廷暂署湖南督军,在陆荣廷未到广东以前,仍由龙济光暂署广东督军。

7月8日,李烈钧再次发表《致龙济光部将书》,谓:“袁逆叛国,天下愤恨。龙氏比恶,终不改悛,阳托附义之名,阴存反复之意,苛敛财货,劫制人权,奸法罔民,悉仍旧贯,负固自恃,屡抗义师,冥顽不灵,猜忌日甚。比者粤中父老,不忍任彼猖狂,遂动义愤,传檄宇内,共图驱逐,风声听树,义气孔张。”

7月9日,李烈钧又致电岑春煊,称:“查此次龙军以三倍之兵力,四面围逼我军,险阨若莅危厓,虽幸获胜利,窃自庆慰,履迹推念,犹怀后惧。请查明因由,迅示维持办法,无任感祷。”

段祺瑞接到龙济光的急救密电后,即令江西督军李纯、福建督军李厚基出

兵相援,并派萨镇冰率海军开放广州。两李虽然接电,但对出兵不热情,只是派兵防滇军入己境。7月6日,段内阁又发令调李烈钧入京另有任用,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光澜为广东省长,调龙济光为两广矿务督办。这命令其实是缓兵之计,目的是把李烈钧调离。

段祺瑞内阁的命令一发布,即遭广东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对。以唐绍仪、梁启超、王宠惠为首的各党派人物纷纷电请北京政府罢免龙济光。段见一计不成,又用一计,派刚由湖南逃出来的与黎、段两人都有相当关系的汤芑铭为广东查办使,并派海军上将萨镇冰为粤闽巡阅使。这样一来,使“海军援粤”就名正言顺了。

段用汤的另一个目的,是想起用其来拉拢进步党领袖汤化龙,以便其进一步操纵国会。

其时,黎元洪打算提拔汤为海军总长,而此次派汤为广东查办使却是段的主张。当初袁世凯派汤为湖南查办使,率领一部分军舰到洞庭湖,随即任命他为湖南都督,后来湖南人送了个“汤屠户”的绰号给他。现广东人民正在坚决要求去掉“龙屠户”,所以,绝不能容许北京政府再派一个“汤屠户”来。在广东人民驱龙拒汤的响亮呼声下,汤也没敢去广东。

陆荣廷本想率桂军向广东和湖南两方面求发展的,当他带领一部分桂军开进湖南后,感到此时北军虽然已从湖南撤退,但湘军的力量是足以自卫的,而湖南地当冲要,财富又远不及广东,因此他决定把他的主要力量集中到广东。7月10日,陆率其人马由衡州班师回桂,而后到肇庆。

陆荣廷率人马回到肇庆后就装起病来,其对龙济光仍想取不战而胜的策略。

这时,西南各省的护国军首领,已是得休便休,不愿坚持到底,乃决议撤销军务院。7月14日,由抚军长唐继尧、副长岑春煊、政务委员长梁启超,及抚军刘显世、陆荣廷、陈炯明、吕公望、蔡锷、李烈钧、戴戡、刘存厚、罢佩金、李鼎新等,一并联名,布告全国。其词称:“帝制祸兴,滇黔首义,公理所趋,輿情一致,桂、粤、浙、秦、湘、蜀,相继仗义,其时因战祸迁延,未知所届,独立各省,前敌各军,不可无统一机关,爰暂设军务院,为对内对外之合议团体,其组织条例第十条规定,本院俟国务院依法成立时撤废。今约法国会,次第恢复,大总统依法继任,与独立各省最初之宣言,适相符合。虽国务院之任命,尚未经国会同意,然当国会闭会时,元首先任命以俟追认,实为约法所不禁。本军务院为力求统一起见,谨于本日宣告撤销,其抚军及政务委员长、外交专使、军事代表,均一并解除。国家一切政务,静听元首政府与国会主持。为此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唐继尧等复将布告原文,电达北京。黎闻军务院宣告撤销,自然欣慰,当日